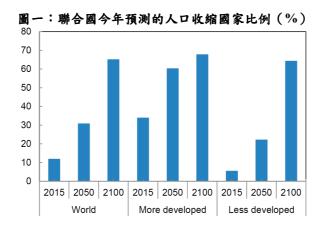


《信報》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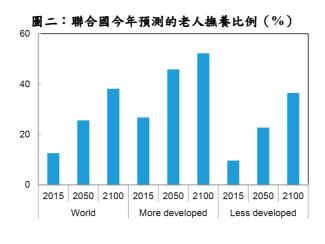
人口增長少又少 貧富懸殊解不了

人口老化近年成為全球焦點。自從戰後嬰兒潮由幾年前開始陸續步入退休年齡後, 新興市場由盛轉衰,商品價格見頂大跌,環球貿易全線萎縮,這些因為人口增長轉弱的 「需求面因素」似在發揮着驚人作用。人口前景變得關鍵,適逢國基會近有相關研究, 將已發展國及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前景拆開來分析,今文借其數據討論一番(見參考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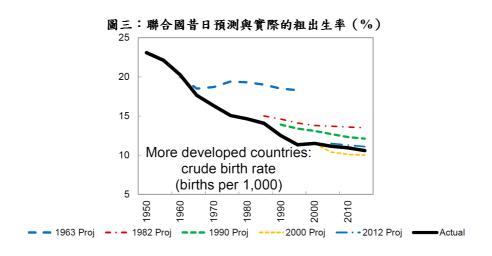
目前全球人口雖仍有增長,但按聯合國預測,本世紀中人口收縮的國家已達三成, 而及至本世紀末,全球更有三分之二的國家見人口收縮【圖一】。若拆開已發展國家、 發展中國家來看,由現至本世紀中,見人口收縮的已發展國比例均大幅高於發展中國。 這清楚顯示,較有消費能力之地將先見需求轉弱,而落後地區則至世紀末亦步後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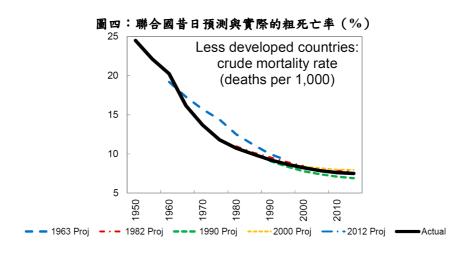
人口萎縮的問題不單在於少了直接需求,同時亦衍生了負擔問題。全球整體來說, 老人撫養比例將由目前的一成升至本世紀中的兩成半,世紀末將升至近四成【圖二】。 拆分已發展及發展中國,則見由現至本世紀中,前者比例為倍於後者,儘管兩者皆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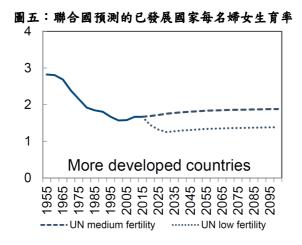
雖然人口預測一直有做,如斯萎縮現象應非近年才如夢初醒,但問題是預測不準。 從聯合國 1960 年代有粗出生率預測紀錄至今,早年預測與往後實際數據確頗有出入; 實在截至 1990 年所作的預測,其實亦跟實際甚有距離,直至 2000 年起的才較貼近實際 【圖三】。不過近十餘年來粗出生率大致橫行,誤差小是否因數據不大變亦可堪斟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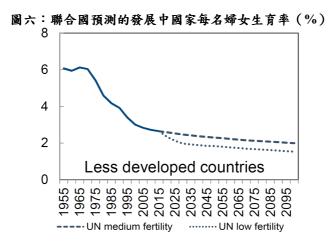
至於當局預測的死亡率則準確得多:1963年的短期預測離譜,但長期預測還可以;而 1980年代起至今的預測皆準確【圖四】。有此成績,蓋拜世界和平、醫學倡明所賜。人口預測包含生、死兩部分,由此所見,相對被動的「死」(除謀殺、自殺)較易測,反而主動因素較重的「生」(除意外懷孕)則較難測,較遠展望亦傾向參考近期趨勢,除非粗出生率的升/跌勢大致穩定不變,否則不消幾年已見預測與實際呈現明顯差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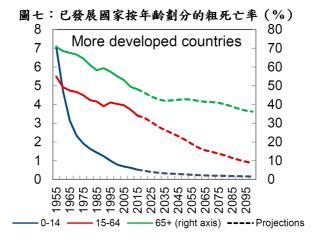


那麼近年的生、死預測又如何?先看已發展國家的生育率。當局估計分兩個情景:中生育率以近幾年見底喘穩稍升的趨勢線性外射,而低生育率的則假設再跌十年才穩,或許這假設先進體系經濟還要再整十年才能結構性回復吧【圖五】。不過無論中、低,本世紀末的生育率仍不能回升到每名婦女產兩名後代。其實,即使每名婦女生產兩名,人口亦會因耗損而整體上呈收縮,何況「中」的長遠預測還不到2,遑論「低」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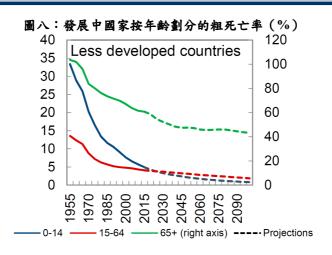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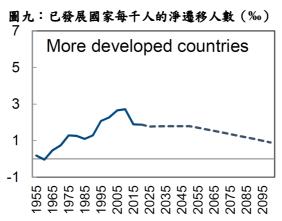
發展中國家方面,雖然目前生育率高於2,但當局較樂觀的長遠預測還是趨向2,較悲觀的更會稍低【圖六】。隨着發展中的變已發展國,兩者的長遠生育率均將趨2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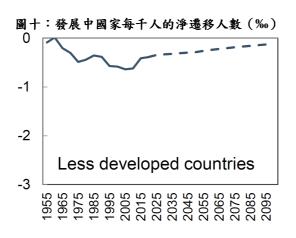


至於死亡率,假設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(人類沒有滅亡)以及醫學進一步倡明下, 已發展國未老先死的比例順理成章將大幅下降【圖七】。至於發展中國家同樣呈跌勢, 尤在65歲以下【圖八】。至於65歲起則因生理關係,每年當中總有近四成百年歸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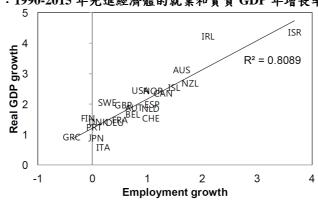




另一影響人口因素為移民,但這只影響已發展國或發展中國,而總人口不受影響,是故兩者的淨遷移率是相反但對稱的【圖九、十】——但「率」則不同,因兩者的人口(分母)不同。觀圖所見,1960至2010是發展中國家淨遷移至已發展國的黃金年代,但近年有回頭跡象,估計跟已發展國的發展空間飽和難搵食有關。退休移民無疑是有,但更大量的是尋找工作或投資機會。君不見敍利亞難民湧入德、瑞等國還因失業率低,故在近年大多已發展國失業率均高企下,發展中國雖仍淨遷移至已發展國,但減少了。推算至本世紀末發展中國或已都發展了,屆時兩者雖有不同標籤,但應無甚淨遷移。



說了這麼多,為什麼人口增長重要呢?所謂有人才會有經濟,先進經濟體的實質 GDP增長多年來與就業增長成極線性的正比關係【圖十一】。所以就業總是政策目標, 而提高總體就業的最直接方法就是「加人」,此乃人口增長重要的原因。在先進體系, 資金不缺,故傳統生產不成問題;缺的只會是知識、技術、消費力,都是人的因素。



圖十一:1990-2015 年先進經濟體的就業和實質 GDP 年增長率 (%)

從上所見,經濟問題是人的問題,而人的問題主要還是生育問題。數據道出現象,但無解釋原因,不過經濟理論早已指出,人愈富貴後,下一代愈被視為消費而非投資,甚至是看成奢侈品,自然買少見少。至於落後地區尤第三世界則因種種原因夭折率高,反而傾向大規模生產。結果有錢的人少、窮的人多,貧富更趨懸殊,形成惡性循環。

愈多財富落在愈少人手上,總體消費自難有效提升,或許這才是當前最大難題。

註: Benedict Clements, Kamil Dybczak, Vitor Gaspar, Sanjeev Gupta, and Mauricio Soto (2015), "The Fiscal Consequences of Shrinking Populations,"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s No. 15/21, October 26.

羅家聰 環球金融市場部